

知识 的 战术研究

当代社会关键词

韩毓海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韩毓海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1

ISBN 7-80109-501-4

I. 知...

II. 韩...

III. 经济-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435 号

- ▶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 ▶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 ▶ 电 话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 ▶ h t t p //www.cctp.com.cn
- ▶ E m a i l cctp.edit@sina.com
-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270 千字
- ▶ 印 张 12.125
- ▶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22.00 元

◇ 序：夜阑卧听风吹雨

本书收录了我 1998 年至今所写的 12 篇文章。这些文章（包括所收的几篇附录）曾经备受争议。

涉及“全球化”的三篇时事评论将我们引入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 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和今天跌宕起伏的有关知识经济命运的激烈讨论之中。这三篇评论贯穿了一贯的观点：资本主义是附着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市场进程和民族国家中的破坏性力量。

1999 年，我曾经腾出部分时间对中关村兴起的历史进行研究，我坚持在“对资本的兴趣”和“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与当时的一般意见相左，我认为：从历史上看，知识经济的兴起、高技术的发展，与私人大资本及其主宰的世界股票市场没有根本上的依赖关系，美国知识经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公共退休基金”这样的投资方式上，它与私人大资本的股票投资方式根本不同；而中关村的历史表明，对资本的兴趣和对私人大资本主宰的股票市场的依赖压倒了对知识创新的追求，这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根本误区。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投机

色彩的金融资本渗入知识经济,对资本的依赖不是知识经济的福音,相反,资本是知识经济的最大破坏力量。1999年下半年,我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考察了美国硅谷,此行坚定了我的看法。当时,纳斯达克指数疯狂飙升,但是,我认为“纳指”本身不能反映高技术知识本身的情况,它充其量只能反映资本对知识经济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高科技知识的歪曲。事实上,当《战略与管理》杂志在2000年第三期以长文点名批评我关于资本与知识经济不相容的观点时,我已经没有必要作出回答。自2000年3月开始的“纳指”的疯狂下跌,已经表明对资本的依赖和追求付出的代价,也已经表明资本反复无常的本性如何破坏知识经济——当然,还不仅仅是对知识经济,而且是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同年,应许纪霖先生之约,我受命对《二十一世纪》杂志刊载的《虚构的全球主义》一文作出专题回应。该文的作者,著名学者京都大学的佐伯启思教授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别开生面而有代表性的解释。他把直接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资本抽逃解释为:亚洲式的“不正确的市场”导致该处的金融资本“失去信心”,从而向美国代表的“正确”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流动。“治疗方案”就是:亚洲国家从头做起,完成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调整,告别“亲友资本主义”或“官商勾结的经济”,重建“正确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国目前倡导的与国际接轨的“结构调整”即此一路。

简单地说,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解释带有普遍性。其错误的最明显原因在于:它把金融资本的抽逃,与亚洲国家的结构调整的时间作了颠倒。这种颠倒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亚洲盛行“亲友资本主义”的时候,金融资本不但没

有抽逃，而是大批涌入；资本的抽逃恰恰发生在亚洲国家痛下决心面向“健康的市场”进行结构调整、治理自己的“泡沫经济”之后，而不是之前。

简言之，不是佐伯启思所说的，由于亚洲“不正确的市场”导致金融资本撤退，恰恰相反，而是亚洲国家力图建立“正确的市场”的调整，导致了金融资本的撤退。事实上，正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而日本政府为治理泡沫经济、建立“健康的资本市场”而实行的“零利率”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但没有使投资返回，而且正是因为短期不看好日本市场，反而造成大批廉价日元没有被日本投资者用于购买日本金融资本，而是涌向美国资本市场，进一步促成了美国经济的泡沫化。

佐伯启思的文章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资本与“正确规范的市场经济”相容，而与“不正确、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不相容；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资本的投机和高额赢利本性决定了它只对后者感兴趣，而对前者完全不感兴趣。真正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是资本的投机和攫取高额利润的本性，所谓亚洲式“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只是它一方面的表现，而不是它的全部，而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化加速了金融投机资本对全球“新兴市场”的投机性渗透和赢利后的转移速度。

佐伯启思那样的解释，把处理危机的方式引向似是而非的“正确”或“错误”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导的当代世界金融体系和资本主义，这是错误的根本所在。面向“正确的市场”的调整不是不必要，而是迫不得已。问题是，如果不能调整资本主导的当今世界金融体系，任何局部的调整都不可能在根本上奏效，有时，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今天的世界流动资本高达 50 万亿以上，这不是生产资本，也不是贸易资金，它与任何市

场和市场经济都毫无关系,而是在金融领域里投机和高赢利的破坏力量,这才是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而对这样一种破坏力量,当今世界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开放和浮动汇率制度,像佐伯启思教授们的方案一样,基本上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有“局部管理”、局部调整的作用。

造成这些错误解释的是一种流行的世俗定见:认为是资本和资本主义造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经济,因而认为没有必要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进行区分。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或者说真实的情况恰恰是颠倒的:不是资本之手“托起”了经济和市场,而是经济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背负起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是个大包袱,也是现代世界反复无常的、根本性的破坏力量。布罗代尔说过:“背负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与生气,甚至是基础经济的力量与生气,是善于创新的小工业的力量与生气,也是生产和交换总体运作的力量与生气。”历史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是随着底层经济而成长、成型和壮大的。”

那么,亚洲金融危机意味着什么呢?言简意赅地说:亚洲金融危机不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给了“错误的市场经济”一个沉重的教训(像佐伯启思等人认为的那样),而是国内和国际资本相勾结、相呼应,给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的市场繁荣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想,答案本来就是这么清楚明了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就抓住这个清楚明了的结论呢?为什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不能深入下去呢?每当想起这个问题,我就想起布罗代尔 1976 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里所说过的话,他说:“我所抱憾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如同在社会主义世界一样,人们拒不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西方,对

于抨击资本主义恶行的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回答道：相比之下，此乃小害，是自由经营和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负面。我对此全然不信。从一个甚至在苏联也能感触到的动向来看，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迟钝而忧虑，并想给它注入更多的‘自发性’（我把话说白了：更多的自由），对他们的回答是：相比之下，此乃小害，是摧毁资本主义祸害所必然产生的负面。我对此也全然不信，然而，我心中的理想社会能有吗？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它在世界上有许多信徒。”

实际上，布罗代尔在 1976 年就已经清楚地指出，解决当今世界危机和弊病的唯一途径，就是必须面向和开创一条偏离、管制、改造并最终摆脱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经济道路。毫无疑问，这条道路听起来有点奇怪，在当今世界自然很少信徒——与之相反，面对世界的经济问题和危机，当代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把着眼点放在“正确的”和“错误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问题上，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短见，经常致力于掩盖问题的实质。例如，有人认为，为了更快地发展经济，资本主义的恶行是不得不忍受的“小害”；另一些人认为，为了保护脆弱的“市场经济”，就不能批评资本主义，因为真正危害市场经济的是“左”的东西，与之相比，资本主义同样只是“小害”。但是，仅就当今中国而言，真正危害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是广泛发生在金融、证券、进出口、房地产、传媒娱乐领域内的腐败和黑社会势力，众所周知，这是根本的危害，但是，把这种根本危害说成是“左”的东西，却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我深深地感到，正是在今天看来，布罗代尔晚年对当代世界危机和弊病的诊断，的确是“不幸而言中”了。

1999 年 5 月 8 日，美国以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

大使馆。第二天早晨,我在家里等待研究生来上讨论课,到近午间,最后一个学生才忐忑不安地匆匆赶来。她的忐忑不安不是因为迟到,而是因为害怕被指责:怕指责她的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受官方指使”——因为他们曾到美国大使馆游行示威。

“以华北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天,面对各式各样的学生,我修改了我的教学计划:我和学生们分段朗读了马克斯·韦伯于1895年5月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当时,我的确希望我的学生坐下来,读一遍《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的正是让思想和理性的光芒照亮社会抗议运动的道路。因为我愿意相信,正像“自由主义”运动不是一个整体,其中包纳了各种立场、观点和出发点的人们一样,“民族主义”运动同样不是一个整体,在相同的旗帜下,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态度,是根本不奇怪的,正如在反抗的队伍里,走着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冲动的人和“完成任务”的人是完全正常的一样,这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实际上,我们完全不能要求和想象一个社会运动是单纯的或者单一的,恰恰相反,从历史上看,任何对社会运动的单一化和狭窄的理解,都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短见,而且必将是对现实中社会运动的歪曲。

而在我看来,韦伯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提供过复杂的分析社会运动的范本。

在整整104年前发表的这篇伟大文献中,韦伯正是以滔滔雄辩又鞭辟入里的理性声音,分析了面对当时的世界经济共同体、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和一场社会运动——东部雇工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韦伯指出:当时以“缩起头来发展经济为唯一要务”,以“自由竞争”的“世界规则”为名义,无条件地开放德国市

场边界的主张,其实代表的是德国中上阶层的利益和声音,并成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虽然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而东部雇工的反抗运动,表达的是德国下层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受这样的政策损害的斗争。它采用的是“民族主义”的方式,但是表达的却是对“自由”的追求。通过这种分析,韦伯揭示了:为什么在现代世界,恰恰是争取自由的民族主义,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而标榜无条件“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庸俗经济学,反而是自由精神的真正敌人,而且不但如此,这种庸俗“经济主义”将会导致“劣胜优败”——“奴隶制资本主义”战胜自由民族主义。

韦伯尖锐抨击了支配当时德国国策的“庸俗经济主义”:为了“发展经济”竟然可以接受一种“奴隶制资本主义”,从而以“自由竞争”的名义,无条件开放德国市场边界,坐视德国东部庄园区雇农大批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两手空空走向黑洞洞的未来。这种“庸俗经济主义”主要由当时德国知识界所掌握,为统治阶层所采纳,并支配了当时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因为它代表的是民族国家内部中上层的观点。

而面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自由竞争”为名制定的超低额工资和奴隶制的管理方式,德国雇农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反抗斗争,这样的斗争反映了下层的观点,即下层面对加入世界经济共同体而所遭受损害时,对自己利益的保护。韦伯犀利地指出,这场斗争的本质恰恰是追求自由:“在雇农的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自由的原始冲动。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当然无法感受自由的魔力。事实上,今天,自由的精神已经很少进入沉寂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了。天真而年青的自由理想已经衰落,不少现代人变得

未老先衰,甚至过分聪明,还以为人类心里对自由的这一最基本的冲动,已经随着‘政治’、‘经济政策’之类的毫无生气的概念,给带进坟墓了。”

韦伯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不但“民族主义”不是同一的,“民族国家”也不是同一的。面对世界经济共同体,民族国家内部经常发生“民族”反对“国家”和“国家”出卖、压迫“民族”的状况。在当时的德国,前者意味着东部雇工反抗当时的“国家经济政策”,就后者来说,意味着德国的中上层以一种“自由竞争”的世界规则的名义出卖德意志民族的长远利益。他深刻指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互相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文化的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看待 1999 年 5 月 8 日轰炸引发的社会运动呢?韦伯的方法能为我们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这是导致了广泛社会参与的一场社会运动,也可能是 90 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与其把它简单地命名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不如分析在这场运动中,国际资本、其支配的大众传媒、国内的各阶层、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政府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聚合、离散和斗争。突出的是,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权威论者”,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国际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在这里鲜明地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它们立即就指责这场示威是一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而据说“代表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北京大学就更不该如此。按照这种“他们的”逻辑,“自由主义”原理已经为经济学的“自由竞

争”所包办，而“民族主义”则“天然”代表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按照这种逻辑，“民族主义”等于一轰而起，不按“自由竞争”的“世界规则”的“牌理”出牌，足以破坏经济发展和引发世界规则的“动乱”，至于这个世界规则给我们的是巡航导弹还是奴隶制度，那却只是一个“牌理”之外的小失误。

而另一方面，这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社会运动，立即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下层中国人的广泛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表明，它并非不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却不仅仅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显然是同步发生在西雅图、罗马的抗议资本主义，寻求民主的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的魅力倒不是从“自由主义”的“人权”原则回到“民族主义”的“主权”原则，恰恰相反，面对世界资本“经济制裁”的恫吓，面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阻碍与世界接轨”、“干扰发展经济的最终国策”的威胁，它一如既往要求的恰恰是基本“人权”：生命权、生存权、文化信仰以及表达权的不容侵犯。对于那些妄图将当代中国抗议资本主义奴役和暴力的民众运动，歪曲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人们来说，我们必须引述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最为理性的原理，来表达这一运动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所可能产生的最为深远的意义，他认为：我们不能运用“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这种本质性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复杂的现代社会运动，而所谓“世界经济共同体”更是一种幻觉。因为恰恰是现代世界资本运动的暴力，假借“自由竞争”的名义，正在迅速地瓦解着“民族共同体”，也瓦解了“自由人的联合”这种“国家共同体”的形式，因此，必须注意“民族”反对“国家”和“国家”违背“民族”这样新的权力斗争形式。他当年分析的一个案例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运动的一个基本原理：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以“自由竞争”为名制定

的超低额工资,造成了发达地区雇工的失业和不发达地区的雇工被迫在奴隶制的条件下工作,所以,雇工争取自由的斗争,经常表现为当代世界以民族主义为名义的反抗“奴隶制资本主义”的自由斗争,简言之:民族主义斗争是反抗资本主义世界暴力剥削制度的自由主义运动的最新形式。

置身于这个物质生活急速膨胀的社会里,同时也是利益分化和财富分配差异急速增大的世界里,置身于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目睹 90 年代以来资本及其关系在世界各地的高歌猛进,我的周围充满了各式各样“理直气壮的人们”,而我深深的困惑却与日俱增。自 1998 年以来,我力图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发出一点声音,但是连自己也是厌恶这“恶泉”般的声音的“刺耳”的,我想我的被赠以“新左派”之名,大抵就是为此。

我一向认为,没有必要去过于关心、纠缠“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这样的生造的命名,尽管它是 90 年代中国知识界自我编制的最成功的话语圈套。但是,它不过提示我们这些以教书和写作了此残生的人们注意:我们今生既以“表述”为业,就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表述”。因为另一个或许被“不幸而言中”的事实是:在我们这个大众传媒的盲目力量横冲直撞、不求甚解的世界里,一种“表述”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因为它正确、它真实——夸大点说,它是真理,而往往是因为它为人所“熟悉”、所“习惯”,简单说是“听起来不错”,比较“顺耳”而已。为了接受大众轰鸣的耳朵和机械的舌头的面试和检阅,对知识的命名与给自己的小儿子起个悦耳的名字,叫着顺口以备其将来为公众所宠爱,这经常是一个道理。对今天来说,“自由主义”就是这样听起来“顺耳”、说起来“顺口”的名字;当然,诸如“新左派”则不是。我的被广为攻讦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不过是提醒“习惯

性的表述”注意：作为一种知识的“自由主义”是一回事，作为一种制度和实践的“自由主义”是另一回事，而某种制度、某种实践，一如既往地诉诸“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这种理直气壮的伟大口号，却是一件必须分析、值得警惕的事。就此而言，“自由”是一回事，把自由表述为“主体的自由”，并在此意义上把自由理解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则是另一回事。用这种表面的“自主性”来掩盖这一社会真实的权力金钱垄断统治关系，把它称为“自由的社会”，这却是一件错事，是有意无意的误导，而且这样的宣扬并不能称为知识活动。那么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社会科学？在我看来，所谓知识活动，所谓社会科学，就是在这种制度、这种社会实践与它所诉诸、所依赖的知识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分析这种关系，揭发这种关系——当社会具有变革要求的时候，则不懈地动摇这种关系，以为有效的社会变革制造前提。

“人们需要自由”，这或许是三岁的儿童也明白的万古长青的道理。但是，以为知识活动和社会科学就在于宣扬这种万古长青的“真理”，这固然可以取悦公众，但更足以误人子弟。如果知识活动不是努力探索我们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进行另一种思考，另一种实践，而是仅仅告诉我们那些谁都知道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把已知的、既成的东西合法化，那么什么是知识活动？如果社会科学不是对社会和知识的差异性、多样多元社会的复杂分析和探索，那么什么是社会科学？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对“自由主义”问题的有意义的研究很少，多的仅仅不过是波及整个社会的“自由主义”顺口溜。而大概这就是我的一位可敬的朋友在《“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述说》中对我进行调侃和教训的原因。他以为人人皆爱自由，而你韩毓海却连这个都不

懂——哈哈，你是多么的可笑啊！但是，即使这篇文章的题目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似是而非的混淆：它把“自由”与“自由主义”进行混淆，甚至把“自由”与某种特定语境中的以“自由主义”为名的叙事乃至统治政策进行混淆，我认为这种混淆对我这位可敬的朋友来说是不应该的，它造成的结果，竟然就是把批评某种时代伟大叙事的人，称为反自由或者不爱自由的人，并借助这种对“异端”的无端嘲笑来宣示其“脚踏实地”的正统。

正像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一样，我坚信即使当代世界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们也不是一个整体；但是，这却不意味着朱学勤先生在《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中所倡议的那样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名的思考方式，在中国思想进程中具有代表性。在我看来，这种思想方式，倾向于把某种社会、制度实践，某种历史现实的政策选择，看作是某种思想方式、某种思潮甚至知识的结果，从而掩盖了社会和制度实践发生的真实基础和动因，同时也无助于理解知识、思想活动发生的真实条件。

与朱先生所说的相反，“自由主义”首先也不是“一种学理”，在我看来，离开了资本主义，包括帝国主义通过暴力参与的近代世界市场的变迁、贸易的变迁、金融的变迁，离开了针对这种变迁而生的社会实践，包括社会反抗运动，离开对外面向世界竞争、对内干预、安排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各种组织形式，一言以蔽之，离开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市场经济、物质活动和现代民族国家这几个范畴，所谓“自由主义”就什么也不是，它充其量是一个空洞的词语之框，里面除了几个干瘪的知识教条以外空空如也。正是“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的说法，掩盖了“自由主义”从来就是与具体、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相关的话语实践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我认为这是这种“言说”

诸多弱点中最脆弱的一部分。

实际上,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及其“言说”也不是“一种学理”,而首先是一种话语实践甚至制度设计,因为与“自由主义”的顺口溜相伴随的是这样一些顺口溜,例如“私有制(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产权明晰是最重要的,私有制是最正确的制度形式”,于是“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这种表述法已经为人们所习惯,但是这却是最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的表述。实际上,当代中国“私有化”的鼓吹者并不见得对公共效率感兴趣,提高公共效率和社会效率,可能是历史上现代改革的目标,但却不是私有化的真正目标。没有效率的私有制企业比比皆是,否则,在私有制度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企业破产、倒闭了。这当然不等于“公有制”就一定有效率,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种种形式的“公有制”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历史和现实使人们反复认识到:私有制经常是没有效率的。例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由主义的祖宗之一,约翰·斯图加特·密尔才提出、发明了“合作制”的形式,并支持创办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合作社”。

人们习惯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这样的表述,但是,关于“合作制”不是感到陌生就是被遗忘了。中国实行“生产合作制”的时间很短,很快为“人民公社”所代替。人们对当今中国农村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很少研究,很快也将会被“私有制”的理直气壮所压倒。这种理直气壮背后是资本主导的世界银行面向“私有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历史上,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论者,都把各种形式的“合作制”看作不规范、不正确,充其量是“过渡性”的制度形式,“合作制”在历史上几经沉浮,命运不济,是“正确知识”流水帐里“上不了户口”的“黑孩子”,为人们反

复遗忘和不熟悉,除了个别被命名的“新左派”,它在当代中国很少信徒。但是,未来终将证明,“合作制”及其创新,也许是中国农村,特别是广大中部农村地区摆脱巨大困境的一条出路。这一条我们不妨留给实践去检验。

另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表述是“市场万能”的顺口溜,与之相反的则是“干预”和对种种干预的面对。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离开包括社会保护运动和政府政策的调整,一个哪怕是相对公正、透明的市场,也是根本无从建立起来的。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在强烈反对“干预”的同时,没有反对过资本无时无刻不在的对市场的垄断、干预和掠夺。当今外贸出口方面的走私骗税、证券领域里的垄断投机、传媒娱乐领域的黑社会势力,无不与此有关。实际上,作为经济关系的市场关系只能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一种,因此,完全独立于现代社会关系,包括国家政治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市场关系”并不存在。果真要追求一个公正的市场,就不是去设想一个独立于其置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国家政治关系之外的“独立”市场关系(这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寻求整个社会关系的民主化。然而,传统社会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却同样接过了自由主义的前提:这就是简单片面地把复杂多样的现代社会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所有权”关系。“自由主义”者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们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由财产关系保证的政治制度之上”的,毫无疑问,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因为当今世界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金钱财产关系之上的制度形式。这是一个可悲的颠倒,事实上是:现代制度建立在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广泛的物质文化活动的基礎上,而且,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例如,比起北欧的社会民主制度而言,美国式的资

本主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不够“公正”，而且是“反市场”的。

在一些人看来，发展市场经济与“发展资本主义”无异，而在我看来毋宁是恰恰相反：若要发展一个哪怕是相对公正、透明、健康的市场，除了对资本反复无常、垄断掠夺的本性加以制度的管制、限制、改造以致最终打击外，别无它途。但是，我们却习惯于资本主义野蛮的政治经济关系，习惯于认为排它的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代名词，而不习惯于各种形式的合作制度，反对各种垄断的社会政治运动是保证物质生产和市场繁荣公正的基础，甚至把这些真正面向自由的追求看成是“左”，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认为这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酿成，应该归功于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不懈的“表述”和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对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表述”是知识分子的习惯，但危险而可悲的是，知识分子帮助制造并且强化了一种“习惯性的说法”、“习惯性的表述”，并以这种方式，对表述的内容与形式、对真实的表述以及表述本身进行规范和压榨，更以“常识”的名义迎合并灌输到公众中去，从而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历史上，不只一个人指出过，这种虚假的“共识”是一个社会的最“不良习惯”，是社会陷入僵化和惰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征兆，这种“共识”可以有许多名字，但是可统称为“意识形态”。如果要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我对当代中国以“自由主义”为名的言说的不快，那首先就是，我认为某些以“表述”为业的知识分子，却竭力以制造、强化某种“习惯性的表述”为务，至于这种习惯性表述是否叫“自由主义”不重要，甚至表述的“正确”与否也是次要的，重要的仅仅是：这种习惯性的表述，是对思想和表述的创造性、对知识工作的宗旨的真正背离。